

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的生成语境考察

黄 擎*

<目次>

- | | |
|-----------------|----------------|
| I. 毛语体释义 | III. 话语权威与权威话语 |
| II. 新旧话语交锋的时代语境 | IV. 文化国情与政治现实 |

I. 毛语体释义

学界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语言风格的命名不同,有“毛泽东语体”、“毛语体”、“毛语言”、“毛语”、“毛话语”、“毛氏话语”、“毛文体”、“新华社语言”、“新华体”等多种说法,所指则大同小异。文体与语体有着不同的涵指。文体指外在表层的语言秩序,以及这种语言秩序所负载和蕴含的深层思维格式¹⁾。文体有广狭之别:狭义的文体即文章体裁;广义的文体则包括种种个体和群体的创作风格,它提供了一种形体的规范,呈现出以特定原则、规范组合文本的方式。广义的文体又可细分为叁个层面:一是体貌,即文体的外在风貌,多与文本给人的直观印象相联系;二是体式,即文体的内在结构,指作为文体标志的文本构造方式;叁是体格,指文章的品第,包含评价。文体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透过体貌,着重分析体式,把握内在性质,考察其总体功能价值。²⁾语体则是语言运用的结果,是语言在反复

* 中国浙江大学 中文系 副教授,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招聘教授

1) 参见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 第1期。

使用中稳定下来的语言体式，包括言与书（即口语交际和书面文体）两个层面³⁾。考虑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话语风格及其辐射力不仅体现在书面材料中，也以语录、讲话、报告等口头语言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本文采用毛语体的说法。尚需强调的是，毛语体并非仅指毛泽东个人的语言体式，而是指以毛泽东的语体为代表的—个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

毛泽东个人的语言风格彰着，对现代白话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其功绩毋庸置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的深重影响，日常生活、文艺活动等无不与政治捆绑在一处，使毛泽东个人的语言风格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权力话语的典范被普遍推行，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连普通民众的日常交际语言也概莫能外。毛泽东个人的语言风格席卷中国上下，并成为—代话语权威的趋势，又使它成为语言多样化和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外在的语言秩序、话语形态只是表层现象而已，其深层则体现了思维模式的制约。因而，控制了语言体式，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控制了话语主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所谓毛语体时代，指的是毛语体的影响力辐射到全中国，并对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个体或群体语言的典范的时代，其时间跨度大体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过，毛语体的生成却并不局限于此时间段内，而是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复杂历史文化语境中逐步形成并定型的。毛语体的产生及其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也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话语争夺向其他领域延伸的结果。中国近代以降的危亡时势，使文学紧契政治，百余年来一直被视作疗救社会、医治民瘼的药饵。谢冕指出，“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地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处。这种‘集中于—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

2) 参见陈伯海：《说“文体”》，《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 第1期。

3) 参见盛永生：《新时期语体研究中的论争》，《修辞学习》2004年 第2期。

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⁴⁾如此这般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必然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⁵⁾。在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也同样经历了从多样化到以主流政治权力话语为中心的高度一元化的发展过程。官方通过一系列文艺运动使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全面掌控文坛,文艺批评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传声筒,代言体、独断体成为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的主导形式。

II. 新旧话语交锋的时代语境

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的生成是在参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近代以降,外敌坚船利炮的大举入侵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风起云涌所构成的战争文化语境,是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生成的第一重历史背景。

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生成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摆脱战争危机、实现民族解放的特殊时期。战争作为其时最大的政治,对文艺制肘最多也最为有力。在战争这一特殊状态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都汇聚到救亡图存的大旗下。配合和服务于夺取战争胜利的时代吁求,使自由、民主、个体等要求位次于统一的思想、高度集权的组织和集体意志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引言部分提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旨在“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种“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

4) 谢冕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第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5) 谢冕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第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艺界早有显现和积极响应。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中就曾说：“为了救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艺是许多手段中的一种，文艺家首先应当使用自己所最善于使用的工具……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艺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文艺。”⁶⁾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接踵而至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构成的战争背景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话语权的争夺。与此相应，新旧话语也发生着激烈的交锋与冲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的问世，尤其是《讲话》的发表，既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的初步形成。以克敌制胜和提升服务效率为中心的战时文艺主张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战时文艺政策仍然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和强化，就显然与文学丰富多元的内在要求相悖离了，也因此造成了一系列文艺悲剧。

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兴生和蓬勃发展，构成了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生成的第二重历史背景。

毛语体时代的主流文艺批评家是在新旧文化的碰撞、融合、交锋与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深受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时代烙印鲜明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文艺功能观。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融会对毛泽东本人的精神文化品格、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革命功利主义的文艺功能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具体体现为借反孔以批判思想专制、通过改造文化来改造社会和深入工农以进行文化启蒙等方面。

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时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相对贫弱、传统文化遭逢西方文化挑战的历史境遇中。就像阿瑞夫·德里克所指出的：“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旋涡中”。⁷⁾在新旧文化动荡的旋涡中，新文化运动最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

6) 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1938年4月)，见《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涤中国社会,新文化思想似疾风骤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西方思想的影响初始是驳杂的,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现代主义等在短时间内被急速引进。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开展和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精神归依和文化思想的向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习效的范本和美好的愿景,并对中国当代文艺的整体风貌和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文艺大众化运动广泛开展,工农兵文艺日益活跃,这些构成了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生成的第参重历史背景。⁸⁾

1937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灯塔。为数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从各地奔赴延安,延安也成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心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开展,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独立自足的地缘政治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学,特别是革命文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同时也是更快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国统区与延安革命根据地存在巨大差异,“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顺应了时代之需,而且在延安,也有了实践的空间可能。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空间就为代表中国革命新文艺方向的新话语的形成、发展和确立构筑了一个可能的地域空间。⁹⁾在这个地缘政治空间里,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演绎他们的政治理想,革命文艺家也将对文艺与

7) 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一卷)《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

8) 参见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第45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9) 参见文贵良:《大众话语:生成之史——叁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描述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政治、文艺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理解由理论思考而付诸大众文艺运动实践。譬如，成为延安文艺核心观点之一的关于文艺阶级性的界说，就是在《讲话》中完整而明确提出的。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述了阶级社会中文艺的社会属性，他把阶级性规定为文艺的最基本的社会属性——“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¹⁰⁾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入了文艺领域，许多文艺问题被视为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也体现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成为时代中心的社会语境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话语就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毛语体时代文艺批评话语的生成，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话语生产也就“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语库，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信念。这个意义上，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话语生产并非一种自然的积聚。相反，话语生产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¹¹⁾。话语生产所派生的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相对应，话语生产的权力同样也与现实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和争夺息息相关。文学话语也概莫能外，“文学话语内部隐藏了反叛理性的冲动，文学话语的感性与故事情节集聚了强大的社会激情”¹²⁾，具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对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或反叛现有的意识形态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学话语的生产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规约。在延安，这种调控已见成效，并初步昭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的命运。近现代以来，文艺批评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绝非单纯的语言问题或文艺问题，而是始终与新旧文化、思想、权力的话语斗争相互牵绊在一起。在历史大变革中产生的新老话语都想争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叁卷），第8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11) 参见南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批评与话语生产》，《作家报》1997年11月13日。

12) 参见南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批评与话语生产》，《作家报》1997年11月13日。

夺话语权, 以通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实施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干预。这就使得政治权力的争夺与文化权力的争夺往往交织缠绕, 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新旧话语的争斗消长来体现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很大程度在于成功地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发动民众投身革命洪流, 实现了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有效联结。¹³⁾

III. 话语权威与权威话语

权威, 《辞海》释义之一为“权力与威势”, 释义之二为“源于拉丁文 *auctoritas*, 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的产生有其社会物质基础, 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有阶级的社会里, 政治权威集中表现为政权。”¹⁴⁾

马克斯·韦伯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权威分为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叁种。他认为, 合法型权威建基于相信所制定的规则具有合法性的信念之上, 传统型权威建基于古老传统神圣的合法性之上, 魅力型权威则依傍神圣性的献身、英雄气概, 以及个人的不凡气质。马克斯·韦伯还进一步提出, 合法型权威的理想类型是以理性为取向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 权威根据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产生, 又根据这种制度和程序来发布命令; 传统型权威的理想类型是世袭的国君, 因历史的传统而获得权力; 魅力型权威的理想类型只是在时代的关键处才会产生。¹⁵⁾可以说, 毛泽东是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叁种权威类型的综合。作

13) 参见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语体》,《花城》1998年 第5期。

14)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中),第355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版(普及本)。

15) 参见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第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为合法型权威，毛泽东经过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系列的机构、会议、决议等一套制度化的运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体制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的领袖。之所以称毛泽东为传统型权威，主要不是由于历史的因循，而是在于毛泽东的权威合乎了中国数千年视君为神而顶礼膜拜的传统。毛泽东能够成为魅力型权威则与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不可分割，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描绘的，他“有着大学教授的气质……他戴着一顶布帽子，你也注意到他有圆圆的农民的脸型，不大的鼻子和一双深沉的眼睛——但是一旦脱去帽子，他那农民的样子就消失了……除去了帽子，毛泽东就显现出一个学者所当有的全部特征。”¹⁶⁾毛泽东的这种不凡的精神气质和巨大的个人魅力极大地增添了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感。

话语权威，是就话语言说的主体而言的，它必须和政治权力直接结合，而“来自四面八方的权力，微妙地重塑我们语言的含义，并通过语言重塑我们所理解的世界”¹⁷⁾。毛泽东的《讲话》确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权威，“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是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服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在以各种形式对这种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还必须以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¹⁸⁾通过延安整风，毛语体不仅在政党内部拥有绝对影响力，而且对艺术家、革命工农群众的语言和思想都起到了重要的规约作用。

毛泽东完成向权威转化的标志，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思想”及其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形成，合乎了战争语境和以延安为代表的根据地的地缘政治空间对话语权威的需要。这一方面是对国际形势的回应——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需要一位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应对这种国际时局的变革；另一方面则是适应国

16) 罗伯特·佩恩：《中国的觉醒》，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叁卷）《思想的永生》，第42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年版。

17) 汪丁丁：《语言的悲剧性》，《读书》2002年 第7期。

18)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语体》，《花城》1998年 第5期。

内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集中表现为国共两党关于中国的合法性领导者之争,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也需要一位精神和思想上的领袖。1943年7月,“毛泽东思想”首次见诸《解放日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写道:“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¹⁹⁾这就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批评的武器和标准,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言说的尺度。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²⁰⁾博古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称毛泽东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并说“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²¹⁾周恩来也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²²⁾这些党内高层领导的表述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就是”之类的语词绝对化、肯定化,作为这种符号形式的创立主体的“毛泽东”,也就在他人的言说和意识中,有意无意地被推向话语权威的位置²³⁾,并在客观上成为对仿效者价值认同和思维路径的规约。

权威话语是话语权威的言说方式和言说结果的相对恒定稳固的形态,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即是权威话语的具体表现。毛泽东个人的言说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文言书写向白话书写的转化过程,其白话文写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时期的初期白话文写作阶段;20年代中期逐步成熟阶段;抗

19) 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20)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21) 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解放日报》1943年7月13日。

22) 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解放日报》1943年8月6日。

23) 参见文贵良:《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书屋》2004年第5期。

日战争时期的成熟阶段，并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话语方式——政论白话文。政论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毛语体显然也是一种权力话语。²⁴⁾这一权威话语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大众自觉仿效的范本，并成为衡量是否革命的标尺。对言说方式的改变与控制意味着对思维方式和思想的改变与控制，因此，可以说毛语体正是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和以其政论白话文写作为标志的权威话语的结合。

在毛语体的号召和制约下，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即经过一个语言文体的习得过程，确立写作者的革命主体性。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写作过程，完成了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向工农兵立场的转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地使语言、文体、写作成为话语实践向社会实践转化的中介环节，并使这种转化与革命实践融为一体。如果说通过毛语体的写作使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获得了主体性，那么反之，知识分子又正是通过这样的写作，使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革命中实现了转化和联结。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毛语体的转述、复制和集体生产。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原先仅仅在几十个知识分子心中浮动的革命理想，转化为数亿群众参加的急风暴雨般的社会运动，知识分子的写作是一个关键性环节。²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语体的生成机制更是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支撑和控制，如官方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力倡导的“三结合”写作模式。毛语体时代，群众性文艺创作与批评极为盛行，对民众语言影响甚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就是当年中小学生在语言与思维上主动仿效毛语体政治话语的一个民间话语的标本。正是通过这样自上而下的发动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毛语体成功地使话语实践转化为革命实践。

24) 参见文贵良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模式的嬗变》。

25) 参见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语体》，《花城》1998年 第5期。

IV. 文化国情与政治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冲击构成了新旧思想并存的复杂文化国情与政治现实,导致功利价值观、政治功利主义成为社会的主导倾向,革命性、阶级性成为民族和时代的关键词语。在此情势下,注重文艺的实践性、功利性和文艺的人民本位观念,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特定历史境遇中,是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复杂的文化国情与政治现实造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与丰富性。毛泽东本人就具有多重身份和复杂的文化性格,既有政治家的胸襟与胆识、诗人的浪漫与想象、农民的率真与质朴,也有学者的儒雅与渊博。毛泽东早年接受的是四书、五经和纲鉴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对他的影响是内在和深层的。他最初是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等人的转述中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延安时期又系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毛泽东反对全盘西化,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毛泽东是儒家文化的反对者,早在创办《湘江评论》时期,他就揭禁反孔大旗,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将法儒对置,崇法抑儒。其实,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所极力排斥的只是制度化与社会化的儒家,而儒家的政治理念与经世观念则通过法家的暗渡进入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层。²⁶⁾从领导和夺取革命胜利的角度,毛泽东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内容,但他也受过五四科学、民主思潮的洗礼,肯定“自我”、“个体”的重要地位,重视文艺的特殊规律,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毛泽东在力倡平民文艺,推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同时,又置身精英文学、古典文学的艺术氛围中,喜好古典诗词等古典雅的文艺形式。总

26) 参见王建刚著:《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第134-1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之，在毛泽东本人的文学喜好、审美趣味和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性和复杂性。

在中国的独特社会文化语境中，文艺与政治本来就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危亡和战争频发的特殊历史语境的催生下，文艺更是与政治亲密接触，文艺批评也附着了明显的战争色彩与政治色彩。在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文化土壤上，即便是再貌似特立独行的个体话语的表达都难以逃脱时代语境和公共话语的深层影响。伴随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铺开，文艺批评话语主动响应了红色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吁求。毋庸讳言，由于政治性因素的介入和战争文化背景的全面影响，中国20世纪40~70年代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也出现了充满悖论的尴尬现象。种种非文学性因素的干扰，使文艺扮演了政治宣传家和鼓动家的角色，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力度和艺术表现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文艺创作与批评的运行线路就这样与政治线路多有重合，偶而错位，很快又被重新纳入与政治行进同向的线路中。文艺的政治化、战争化确实给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面貌、品格、功能的丰厚多姿带来了损伤，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化曾经极大地提高了文艺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京剧现代戏为主的“样板戏”就膺得了“威振乾坤”的绝对话语霸权。当然，这些是以减损审美品性和削减文艺功能为代价的。不独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在政治化的荫蔽下遭遇尴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愿景这一时代风云的裹挟和激荡下，中国近现代文学整体都具有“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的共性。²⁷⁾

在中国的文化国情与现实政治语境中，文艺功能发生了位移，由审美、教化、认识叁大功能合一到向注重教化功能中的政治宣谕功能倾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吁求。合法性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²⁸⁾，对

27) 参见谢冕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第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28)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第55

政治权力的认可则是合法性的要义所在,“合法性的职能在于回应社会同一性所特有的社会整合的需要”²⁹⁾。政治的合法性原则追寻的是规范和秩序,具有与权威性相伴相生的强制力,而“对合法性的主要检验,是看特定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长期政治文化’的程度”³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志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激发了民众积极参与的政治热诚,形成和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好似空气一般无形却无处不在,将社会成员紧紧束缚其中,文艺创作和批评由此成为官方权威话语的有力注解。“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写作组“方岩梁”在《“大有大的难处”——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一文中,就把《红楼梦》当作抨击现实政治敌对势力的政治历史小说来解读。文章说,“‘大有大的难处’,这真是一语道破了贾府的没落趋势和困境,典型地反映了正在走向没落的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今天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大则大矣,但外强中干,困难重重而无法摆脱,在这一点上,倒是很象《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用‘大有大的难处’刻画这类反动的‘庞然大物’的虚弱本质,不也非常逼真吗?”³¹⁾这种以文艺为诠释政治的例证的批评思路,在毛语体时代甚为风行。

综上,毛语体时代的文艺批评话语是在中国近代以降的战争文化语境、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以工农兵文艺为中心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广泛开展这叁重历史背景下生成的。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最高权力体系话语,毛语体对现代白话的发展起过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对文艺批评实践与当代文学风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情境中,它也成为文艺多元化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革命和战争的环境中,突出文艺批评的功利性,使之成为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是具有历史合理性和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29) 让-马克·夸克著:《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第23-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版。

30)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第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31) 方岩梁:《“大有大的难处”——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红旗》1974年 第4期。

政治合法性的。然而，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后，这种对文艺批评功能的片面认识没有因势而变，反而随着阶级斗争被人为扩大化而不断趋于极化，文艺问题多迅疾上升为政治问题，在文艺批评实践中造成了简单粗暴的政治性批判，戕害了当代文艺批评和当代文学的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 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 钱理群，《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 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 金健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 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黄曼君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李劫，《李劫思想文集》，西宁：青海出版社，1998。
- 复旦大学文贵良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模式的嬗变》，2003。
- 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국문초록>

모어체(毛语体)는 최고 권력 체계의 언어형식이며 주로 모택동의 언어를 가리킨다. 모어체에는 모택동의 권위적 언어 및 그의 백화문 형식의 정치토론 문장으로 대표되는 권위적 문장이 포함된다.

모어체 시대는 중국 전역에 걸쳐 모어체의 영향을 받은 시기를 가리킨다. 이 시기에는 중국인의 일상생활을 포함한 각 영역에서 모어체의 영향을 받았고, 또한 모어체가 개인 혹은 대중 언어의 모범이 되었다. 그 시기는 1949년 신중국(新中国) 성립시기부터 문화대혁명이 끝나는 1976년까지를 포함한다.

근대 이후 중국의 전통 문화사상과 서양의 현대 문화사상의 충돌로 인해 중국에는 신사상과 구사상이 병존하는 복잡한 문화 및 정치상황이 형성되었다. 근대 이후의 전쟁문화, 5·4운동 이후 신문화운동의 흥성과 발전, 문예대중화 운동의 광범위한 전개 및 공농병(工农兵)문예의 발전이라는 3가지 역사배경 아래에서 모어체 시대의 문예비평 언어가 형성되었다. 당시 문예비평언어 생성의 언어 환경에 대한 고찰을 통해 언어는 사회권력 관계형성과 재현의 장소이며, 언어 형식 형성의 권력 또한 현실 사회의 정치권력 분배 및 쟁탈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주제어 : 毛语体, 文艺批评话语, 生成语境